

中国经济发展中理性观念演变历程

金 碚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理性观念演变进程,展现为“理”和“真”的关系不断深化演进。当经济理性在务实的实践过程中占据主导、中国经济现代化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运行的机理就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自此往后,经济发展的实物目标(计划指标)就让位于对经济价值的无限追求。在传统社会中,一旦注入经济理性,就会改变传统社会的财富观^[1],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允许劳动致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以GDP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压倒性核心指标。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政府就开始感受到了“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因而提出了要有“科学发展观”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已经看到了亢奋的物质主义的局限性或显著缺陷,是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浅度理性化具有很大局限性,必须转向深度理性化。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向纵深推进,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新时代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所谓“纵深推进”,不仅是经济效率(资源优化)的继续提高,而且是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以及制度形态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深度推进,需要将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导入更有效地实现真性目标的轨道,实际上就是导入深层理性化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因此,理性升华,真性引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度推进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 经济理性 经济现代化 本真理性 价值文化

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100732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从中国实践中发展为毛泽东思想,成为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建设的指导原则。所以,建国后的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观念演变的历程:树立“革命思想”、进行“思想改造”、大胆“解放思想”等,都反映出经济发展同思想演变的高度相关性,按照当时政治理论的解释叫做:“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有其思想理论依据。众所周知,从坚持两个“凡是”原则到转而接受“实践是检验真

[1]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各种宗教的原教旨教义)的传统观念,都认为追求物质财富是不高尚的,甚至是不道德、不正当的。

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成为中国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马克思的原话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理论家们论证前一个命题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两个命题,一个表述为“实践是……标准”,另一个表述为“实践中证明”,那么,两者的涵义有差别吗?前者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后者强调“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前者强调的是认识结果(真理),后者强调认识能力(思维)。也就是说,前者强调人的认识对不对,后者强调人的思维有没有认识能力(现实性和力量)。按照前一个命题的逻辑,主要考虑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按照后一个命题的逻辑,就必须考察“理性”与“真性”的关系,进而考虑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性着重于“能不能”,真性着重于“对不对”。本文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及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就是围绕着“能不能”和“对不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逻辑而不断演进的。中文的“真理”一词十分精巧,“真”和“理”,恰好将本文所涉及的真性与理性的概念融为一体,同时也可以区分“真”(真性)和“理”(理性)的不同含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理性观念演变进程,就展现为“理”和“真”的关系的不断深化演进。

一、以实物为目标:朴素的物质主义

世界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大多数都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启动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从经济运行的主导机理和经济制度的一般分类看,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如果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可以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经济”)。那个时代的中国,贫穷落后、天灾战乱、列强分食、民不聊生。共产党举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赢得民心,赶走列强,推翻旧政府,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承诺广大人民在新国家中“当家做主”,实现和平,消灭饥饿,达到丰衣足食和国家强盛的民族发展目标。按此思路,新中国建立后,从分田到户到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建立人民公社,发动工业“大跃进”,都是以达到一定的实物量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新中国建立后的顺利恢复战后经济,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制造的各项主要指标,使人们相信,只要方向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可以实现预定即计划安排的实物量指标,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正是这样的观念,导致产生了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计划经济的“科学幻想”,同时,关于社会制度形态的目标定性也从“新民主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从而也就可以认定实行计划经济是“对”的。

以达到计划确定的实物量目标作为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方式,无论方向目标“对不对”,都很容易接受计划经济的“科幻”思维,认为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忽视“能不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美好愿景,缺乏经济理性。当幻想的“赶超”目标不断拔高,“创造新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的雄心极大膨胀时,社会就完全失去了理性,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不仅无法实现幻想目标,而且使整个国家陷入可能“被开除球籍”的经济落后和结构破坏的境地,甚至连“吃饱饭”都成为无法确保实现的承诺。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深陷于“对不对”的僵化思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不对”的问题不得不暂时退

[1][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居其次,而侧重于考虑“能不能”的问题,即能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给广大人民一个可以接受的基本生活条件。因而,受到实践的教训,理性思维终于占据主导。当时提出和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理论层面上讨论的似乎是“对不对”的问题(何为“真理”,什么是“政治正确?”),而真正要解决的却是“能不能”的问题,实质是在关于“对不对”的讨论或争议中解决“能不能”的问题,即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务实精神与德国哲学的理性精神(马克思的理论表述所体现的)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我们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其作为政治原则,完全是从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来理解的,并不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理性深思的哲学命题来对待,就可以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和赞同:按照中国人的务实逻辑,既然实践需要这样的思维,它当然就是正确的原则。不妨可以简单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理论讨论和思维演变,每一次思想突破都是凭借感性观察就可以务实地实现的:从“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摸着石头过河”,“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直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实就是“实践”,就可以判断真理,这就是非常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务实理性。这样,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在务实精神中逐步实现理性化,中国经济发展也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可见,当年的“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是解除对经济理性的束缚。思维方式的转变非常符合中国的务实精神,结果则是让经济理性得以张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推进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以其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获得了马克思深刻严谨的理性思维力量。

当经济理性在务实的实践过程中占据主导、中国经济现代化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运行的机理就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自此往后,经济发展的实物目标(计划指标)就让位于对经济价值的无限追求。于是,实物产品的社会功能逐步蜕变为充当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人们越来越关切经济价值而不是实物产品,特别是当经济理性推动的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实物产品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物质产品产量越大,其边际效用越是递减),对于经济价值的关切更加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朴素的物质主义成为历史。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二、转向市场经济:亢奋的物质主义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转变为实行和发展市场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经济理性,启动经济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进程,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除了少数拥有丰富的特殊资源的国家之外——经济现代化的共同道路。在传统社会中,一旦注入经济理性,就会改变传统社会的财富观^[1],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允许劳动致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并以GDP(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压倒性核心指标。尽管以GDP为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指标具有众所周知的缺陷,但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时期,没有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DP,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的理性特征所决定的。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所谓经济理性具有什么性质呢?它具体体现在哪里?首先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层,即相信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认为他们的行为都会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标。并且相信,只要允许他们按理性自主行事,经济发展就有了强大动力。

[1]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各种宗教的原教旨教义)的传统观念,都认为追求物质财富是不高尚的,甚至是不道德、不正当的。

因此,收入增加、财富涌流、GDP的高速增长,是经济理性张扬的自然结果。只要对微观经济主体“松绑”“放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制度,就可以启动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为经济现代化奠定基础。正是按此逻辑,经过短短30多年,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如果按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即所生产的实物总量,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济理性展现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理性并非抽象人性,而是具有显著的商域文化特质^[1]。中国人的经济理性有其显著特色,务实的工具主义倾向特别强烈。市场经济为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的经济理性具有工具理性的性质,即人们所追求的理性目标实际上是工具性目标,例如收入、财富、GDP等,而本真目标,即“使用价值”,反倒退而成为追逐工具性目标的手段。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是以“目的”与“手段”的反转为特征的。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追求工具目标的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能量就越大。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并且储蓄率特别高的民族。强烈的勤劳刻苦和财富积累意识,支撑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人很快从“穷人”的代名词,几乎已经变为“有钱”的代名词。

当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思维,不必考虑“对不对”,“不要争论”何为真正正确,一心向着如何解决“能不能”的问题。而且,“能不能”的目标是高度工具化的:人们相信,赚钱、创收、财富、GDP就是经济发展成就的标志。不过,实物性目标退而成为创造和追逐工具性目标的手段,尽管可以推动经济强劲增长,但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政府就开始感受到了“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因而提出了要有“科学发展观”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已经看到了亢奋的物质主义的局限性或显著缺陷:饥不择食地追逐物质财富,而且是其交换价值形态——货币,而对于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有用之物,却可弃之不顾,或视而不见。这严重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本真价值,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浅度理性化具有很大局限性,必须转向深度理性化。

回顾改革开放的经历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向市场经济道路,是一次非常伟大的进步,接受市场经济思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注入经济理性,具有义无反顾的性质。不过,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缺乏透彻深思,所以,在不长时间内就发现了,经济理性的粗狂张扬,存在可能导向背离人类发展本真价值的严重缺陷。

三、理性的本真复兴:权衡的物质主义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经济现代化在“能不能”的问题上取得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而且经济规模继续快速扩张时,“对不对”的问题越来越突显。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我们的路到底走得对不对?中国究竟要追求怎样的经济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的真正价值是什么?经由反思而认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正在走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之,在摆脱困扰了中华民族200年的“落后”魔咒之后,中国经济现代化开始转向“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好生活”的目标。

[1]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参阅金碚《以创新思维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郑州》《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此时,工具主义的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代化模式表现出了其明显的局限性,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和本真目标,并非都能够通过工具理性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达到。甚至,不受约束、为所欲为的经济理性,可能导致与本真价值目标的背道而驰,例如,环境破坏、气候变异、贫富极化、行为腐败等,特别是当贪婪之心达到几乎失去理智的程度,其恶劣行为令人发指,如官员反腐案情中表现出的私欲疯狂,大概可以成为这一时期一个永远不会被忘却的历史疤痕。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说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主导下,商品二重性中的交换价值成为唯一目标,而使用价值反而居于无关紧要的地位,有外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换价值为主人,使用价值是奴隶”。我们今天看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严重污染、各种资产的金融化狂“炒”现象、社会道德的过度自私化(不要忘记:工具理性的基本假定就是人性自私)等,是工具主义的经济理性所难以解决的,实际上就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经济学家称之为“理性的非理性”或者“非理性的理性”。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并非理性的过度,而恰恰表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性化过程还非常不充分,还处于“浅度”理性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即经济理性化程度尚表现为缺乏“自律”的低度文明状态。从强制性约束到自我约束,是理性从“浅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而自律的社会道德的形成,正体现了经济现代化本真复兴时代的到来。

当前,中国的经济现代正处于能否实现本真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所谓本真复兴,就是要实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平权”,工具理性与本真价值的协同,表现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目标的多维性,以及多维目标之间的权衡。我称之为“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之所以还是“物质主义”,是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支撑,其它社会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基础和条件。经济这个“工具”仍然责任重大,无可替代;“金钱”仍然非常重要,尽管它并不是人类的本真目标。

进入这样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动能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同高速度增长时期的经济动能相比,高质量发展时期的经济动能应更具有“方向自觉性”,即不仅要关切“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要关切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对不对”?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不仅是理性化过程,也是真性化过程,所谓“真性化”就是,向着人类发展本真价值的目标演进,今天的经济增长必须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深刻的挑战在于:也许我们知道如何做才是“对的”(什么是本真价值),但要做“对”却可能也是最难。要完成很“对”但很难的事业,考验人类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如何让“理性”与“真性”相辅相成,协同张扬?应该说,当进入经济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阶段,限制理性张扬的障碍大多已被突破,而如何克服实现真性价值的障碍,尤其是如何以理性方式实现真性目标,会成为更大挑战。因为,真性目标并不体现为货币,也就是说,并非只要有“金钱”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真性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经济现代化的真正的历史逻辑。

四、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互动交融的文明过程

经济现代化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时期开始启动,其推动力基于经济理性的“觉醒”。在此之前,神秘主义、蒙昧思想、神权、王权等,压抑了基于个人权利和科学思考的理性思维。因此,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即让经济理性得以张扬,并由其主导,经济发展才能走上理性化的道路。这是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共性,可称为历史进入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经历了两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理性的解放,特别是经济理性的张扬。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

革开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朴素理性的觉醒,即物质观的觉醒;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工具理性的觉醒,即财富观的觉醒。

问题的深刻性在于,经济理性的觉醒并不是在一个“空盒子”般的空间条件中发生,而是在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它绝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而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以“变形”的具体状态出现。经济理性体现为每一个人的所思、所言、所行中,而人的所思、所言、所行总是受一定的价值观和文化环境所决定和影响。也就是说,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在这一点上,人的行为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是这样。人性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价值文化环境而作为赤裸裸的“理性人”(经济人)而存在。所以,经济现代化,尽管是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化的过程。所谓文明化,则是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相互交融的复杂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

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既有的价值文化环境和制度形态,能否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以适应经济理性张扬的要求,是第一个关键问题。因此,经济现代化的启动,通常有赖于某种“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甚至战争,为经济理性开路。但是,所有的革命都不可能为经济理性的张扬创造一片理想“净土”,任由经济理性天马行空。而是以极为顽强的方式,紧紧纠缠着经济理性,影响着经济理性的作用方向和丰富的表现形态,例如,从经济理性上可以说“人人爱财”,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取财之道却大为不同。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经济理性就是绝对积极的力量,而文化和制度因素就是消极的因素。相反,经济理性也绝非神力无边,绝对的经济理性是无法存在的,一定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环境,是经济理性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经济理性、价值文化与制度形态总是同时存在,三位一体,无法分离的。这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什么经济现代化是一个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的互动交融的文明过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由经济理性独自决定的物质技术(资源配置)优化过程。其实,作为一个文明物种,人类最大的优势不是放荡的理性,而是自律的理性,负有善美关怀的理性。

五、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度推进:理性升华,真性引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理性虽然得以张扬,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过程还远未完成,尚处于“浅度”阶段,文明进程的强制性规则尚未理性化地成为自律性行为,而且许多强制性规则本身还未达到较为成熟完美的理性化程度。经济改革还远未完成,而此时,经济现代化的真性化要求却已成为紧迫问题。中国经济现代化进入了各方特别“纠结”的时代。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向纵深推进,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新时代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所谓“纵深推进”,不仅是经济效率(资源优化)的继续提高,而且是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制度形态的现代化,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没有特色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抽象的)经济理性可以一元化,但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必然是多元性的。就如同生物世界的进化,竞争和进化的结果绝不是趋向于一元性的“最优化”境界,甚至物种间竞争也并非“优胜劣汰”,而是发展为越来越多样化的世界。当我们饥饿时,最需要食物;贫穷时最需要钱;国家落后时最需要GDP,而当我们不再落后时需要什么?需要美好

[1][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生活,需要幸福,需要发挥人的潜能,需要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人类发展的深度理性,也就是真性(本真)价值。

人类的需要是多样性的,美好生活的目标是多维的。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没有实践过,因而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人类发展目标。改革开放40年,我们知道了需要尊重理性,也越来越懂得对真性的关切,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和政策意向。但是,探索经济现代化未来的道路仍然充满许多困惑。改革开放将处于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本真价值应能驾驭经济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方向,而经济理性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在这样的新时代,如何形成更具方向自觉性的新动能,以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的艰巨使命。

新动能的特征是具有方向自觉性,这取决于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安排来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改革开放的前40年,奋斗目标相对单一,牵住“牛鼻子”就可以带动全局。而今,在目标多元下进行选择,很难做到符合“帕累托改善”的要求。方向自觉性,不仅体现在目标选择的自觉性,在工具性目标和本真目标的权衡上达到优化;而且体现在手段选择的自觉性,即不能以损害本真价值的方式、“不择手段”地来达到目的(往往是工具目的)。方向自觉性是对经济现代化新动能的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是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一个关键,实际上就是要达到理性与真性的统一。为此,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度推进使命的路径创新,而且是高度原创性的创新。

进入这样的新时代,必须为创新提供和创造更适合的环境,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都要以有利于创新为准则。客观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刻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取向(特别是原创性创新)的民族,我们的“求同”意识远远强于“求异”意识。我们的思维定势往往是:“别人能做我也可以做”,而不是:“别人这样做我就那样想,那样做”。我们更倾向于宁可承受赌的风险(如凯恩斯所说,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就类似于彩票。),也不很愿意承受创新风险,特别是长期性创新风险。这就会限制创新的想象力,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的想象力,而新时代恰恰是一个特别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时代。我们真正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让人才发挥能力,特别是发挥想象力的文化环境和制度安排。问题的深刻性在于:许多人可能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要改变它却发现困难极大。因为我们正处于长期形成的价值文化环境和制度安排的现实之中,而要改变这一切,所要克服的传统“惯性”如此巨大,几乎就如同是要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离地面,举上天空!

可见,由于经济现代化是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制度形态互动交融的文明过程,理性的张扬并不能替代真性的实现。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化进程必须达到能够同真性复兴相容,有效推进真性目标的实现,即走向“求真”之路,才是人类发展真正的理性体现。

经济理性过度的工具理性倾向,是经济现代化的理性尚处“浅度”的低级阶段的突出表现之一,工具理性是浅层化的理性。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深度推进,需要将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导入更有效地实现真性目标的轨道,实际上就是导入深层理性化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经济现代化的深层理性化应更倾向于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社会管理的制度成本,提高营商便利性和行政管理效率。制度改革应导向于使资源配置更有助于能够提高人的素质,而且,制度的效率目标应与价值导向目标相协调。不能再以过高的价值文化代价(伦理素质代价,即通常所说的“道德滑坡”)来获取强制性经济增长的短期成效。逐步改变过度的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中国文化的务实精神相互强化,因缺乏价值文化的本真价值引领和制约,而使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失去平衡性,导致经济现代化出现价值伦理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由于经济理性的极端化是假定人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在经济理性的“浅度”阶段,人们可能

会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人性取向,即认为凡是正常的人都是利己自私的。其实,如果经济现代化真的是走向人人自私的方向,人类就必然走向堕落,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道理非常简单:在现实中,没有人会认为或承认自己是自私的“经济人”,大多数人认为自私的人不是“好人”;也没有人或经济组织会愿意同自私的“经济人”合作,所以,如果真有极端自私的经济人,他在现实中是难以生存的(难以被社会接受)。可以说,真正的“经济人”只可能存在文学作品中,而难以在现实中存在。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伊所指出的:“总体来说,极度贪婪的个人长期来看不会成功,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成功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最优秀的商业领袖比起金钱更关心事业。”^[1]因此,经济现代化向深度推进,其理性化的方向是社会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制度的完善化显著增强,尤其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过度张扬可能发生的价值伦理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即使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超越物质主义的个人理性,形成社会合作的道德环境也是符合深度理性的逻辑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伊说:“卢梭(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自利的个人未必会参加合作——即使这类合作能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要求社会制度强制实施合作,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现代经济需要——而且能获得——更多的合作,这种程度是‘强制执行’或是‘互惠关系’无法解释的。即使我们并不期盼着别人在未来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帮助别人。如果碰上陌生人问路,我们通常会告诉他们。而且,我们期盼自己日后向另一个陌生人问路时,对方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种行为并不是理性的——如果理性指的是‘自利的物质主义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却具有适应性:人们能够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社会,不但更美好,而且会更加繁荣。”^[2]

可见,经济现代化的理性化进程,需要不断深化,并形成更符合人类本真价值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形态,实现个体理性与社会合作的良性互动。因此,理性升华,真性引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度推进的正确方向。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向着更能体现真性的人类深层理性的方向提升文明水平,人类才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能够持续存在、繁衍和繁荣的物种,而不至于因自己“劣币驱逐良币”的非理性行为而被开除球籍。总之,中国经济现代化正在进入新阶段,从浅层(浅度)理性化向深层(深度)理性化方向推进。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务实”,而后者的基本特征则是“求真”。从“务实”走向“求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化蝶升腾之道。

〔责任编辑:如 新〕

[1][2][英]约翰·凯伊:《市场的真相——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其他国家却贫穷》,叶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第294-295页。